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论要^{*}

荣兆梓 李亚平^{**}

【摘要】本文按照为什么生产、如何生产以及再生产发展趋势这三层逻辑,展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三大要义的探讨。首先,劳资共享合约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必须兼顾劳动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个涵盖“劳动者完全利益”的企业生产目的就是增加价值,它不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社会生产目的在企业层面的价值形式的表现。其次,增加价值的生产方法有两种,即绝对增加价值生产和相对增加价值生产,其中相对增加价值生产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手段。相对增加价值生产以创新驱动,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最后,社会主义的创新红利分割兼顾劳动者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消费与积累的权衡中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规律只能是经济增长带动劳动者消费增长,消费增长促进劳动者能力提升,劳动者能力提升带动企业创新的持续加速,进而带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积累规律。

【关键词】劳资共享合约;绝对增加价值;相对增加价值;创新红利;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一般规律

一、引言

特定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可以从三个维度概括:一是为什么而生产,

^{*} 本文节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公有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七章“公有资本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容略有增删。

^{**} 荣兆梓,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李亚平(通信作者),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E-mail:09035@ahu.edu.cn。

引文格式:荣兆梓,李亚平. 2026.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论要[J]. 政治经济学季刊, 5(1):1-30.

Cite this article: Rong Z Z, Li Y P. 2026. An outline of the basic economic law of socialism[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5(1): 1-30. (in Chinese)

二是如何生产,三是再生产的发展趋势。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念,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依次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三重规律:一是资本以剩余价值为生产目的,二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是资本积累(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

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如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点就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最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得他们得到全面的发展”(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9,p. 455)。这一表述虽然初步地包含上述三方面内容:一是生产为了“最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二是生产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三是生产的发展使得全体社会成员“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所有这三方面的表述都是不充分的。这种产生于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概括,充其量也只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0 版,完全没有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特点,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 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日益展开,中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凤翔,2019;孟捷,2022)。本文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可以概括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绝对增加价值生产与相对增加价值生产,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能力全面发展,进而推动创新加速和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的良性循环,直至通往共产主义。事实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的行为规律,或者说公有资本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平等劳动下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以下按照为什么生产、如何生产以及再生产发展趋势这三层逻辑,展开对这一规律的讨论。

二、共享合约下的企业生产目的

(一) 社会生产目的与企业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生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从根本上说,这个生产目的具有使用价值性质。具体地说,社会年产品总量中,扣除补偿生产资料消耗以备下年生产所需之外的社会净产品,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对象,是社会生产目的的使用价值形式。然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

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其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满足社会需要的全部净产品总是具有商品价值形式,表现为净产品价值,也就是社会生产的全部增加价值(added value)的总和。增加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价值形式。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劳动是间接社会劳动,其社会有用性需要通过产品售卖在市场交换中实现,因此,企业追求的直接生产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商品价值,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共性特征,公有制企业也不例外。与私有制企业单纯追求剩余价值不同,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包含了必要价值与剩余价值在内的增加价值,必要价值用于满足企业劳动者的消费需要,剩余价值则可以满足劳动者的社会公共消费以及企业和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二者一起构成劳动者完全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虽然与社会生产目的在形式上有区别,但其内容却是完全一致的。

从社会角度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适应。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仅通过公有制企业来体现,而且通过国家在经济治理中从劳动者整体利益出发来体现,通过执政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来体现。应该看到,社会经济中还存在大量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企业形式,它们的生产目的各有差异:个体经济把必要价值放在首位,私人资本把剩余价值放在首位,而公有制经济则必须兼顾二者(荣兆梓和王亚玄,2021)。

社会生产目的和企业生产目的存在使用价值形式与价值形式的二重性。社会的生产目的是劳动者的完全利益(整体利益加上个人利益),是劳动者美好生活需要,是物质文化生活的逐步提高,属于使用价值范畴。但具体到不同所有制企业,由于劳动都是间接社会劳动,都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劳动的社会有用性,所以企业生产目的直接表现为商品价值形式。企业生产目的因所有制不同而不同,公有制经济以增加价值为目的,私有制经济以剩余价值为目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生产目的的多样性。

(二) 公有资本与劳动者个人的共享合约

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公有资本为实现形式,其原因在于其特殊的历史性质和固有的内在矛盾,包括公有制的二重规定性——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公共所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以及公有产权的双重排他性——外排他性和内排他性^①。这意味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规定性背后,其生产关系的实质内容是劳

^① 关于外排他性和内排他性的论述参见荣兆梓(1996;2023)。

劳动者之间平等劳动的关系;因为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全体劳动者的生产关系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以劳动为尺度,建立在劳动能力不平等的基础上。平等劳动表现为劳动者之间的决策平等、分工平等、分配平等和劳动能力发展机会平等,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进步性,又体现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平等劳动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 434)。公有制以及平等劳动的内在矛盾,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商品、货币乃至资本关系的深层基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些“DNA 信息”便逐步展开,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成长轨迹。

国有制经济中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不具备充分的直接性。社会主义自始至终包括两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谓大一统的“国家辛迪加”从来没有支配全部社会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天然的“缺陷”:其生产资料所有者成员(全体人民)与全民所有制经济从业者在规模和构成上存在巨大差异。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两种生产条件——物质生产条件和人身生产条件——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直接结合的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国家集中的“统分统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需要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无论何种情况,全体所有者成员中都只有一部分,并且是一小部分幸运地被选择成为全民所有制职工,而其余大多数所有者成员,并不天然地拥有这些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权。我们将此称作生产要素的相对分离,它是公有资本产生的必要条件。

公有资本产生的充分条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形成,其中企业公司制改革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股份公司制是市场经济下国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公司制改革将原先一个大一统的国有制,改造成为国有股份资本分散投资的许多公司法人资本,使得这些拥有独立产权并在市场竞争中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能够在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竞争的同时,也能在相互之间展开公平的市场竞争。国有资本成为许多公司资本,至此,企业不仅能通过市场购买各种生产资料,而且能通过市场购买劳动力商品,实现生产要素全面的市场配置。

企业与劳动者在市场交易中是“双向选择”,国有股份公司与劳动者的“劳动合约”是市场合约。理解这个合约的性质,绕不开国有资本普遍存在的运行中“自行增殖”现象。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增殖,即剩余价值的产生,只能源于劳动力商品价值(工资)与使用价值(劳动所创造价值)的差额。国有资本的价值增殖同样只能由这个差额来解释,劳动力使用权的让渡是产生劳动力商品价值与其使用价值差额(即剩余价值)的前提。国有资本与劳动者个人的市场合约同样具有劳动力商品买卖的性质。但是,公有资本的所有权属性又决定

了,它在购买劳动力商品的同时,需要向企业的从业者(职工)让渡一部分公司法人治理权。通过合约,国有企业的从业者以一定形式参与到公司治理之中。因此,这个市场合约不是单纯的劳动力商品买卖合约,而是劳动与(公有)资本的权利共享合约;合约形成的不是雇佣劳动关系,而是平等劳动关系。公有制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主导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平等劳动是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

劳资共享合约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必须兼顾劳动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个涵盖“劳动者完全利益”的企业生产目的就是增加价值,它不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企业层面的价值形式的表现。国有资本的目标追求并非单纯是生产性、市场型的,它还要按照资本所有者(国家)的意志,满足多种社会功能,包括制度功能和宏观经济的治理功能;公有资本追求的不是单纯的剩余价值,而是包含了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内的增加价值。

(三) 增加价值体现劳动者完全利益

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价值仍然由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 C 和活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 L 构成。活劳动创造的增加价值 L 又进一步分解为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即 $V+M$,商品价值的构成仍然是 $C+V+M$ 三个部分。增加价值是新创造的价值,是企业劳动者劳动投入的对象化。增加价值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劳动者个人收入和劳动者社会收入,二者对应着《资本论》中所说的补偿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必要价值和超出劳动力价值之外的剩余价值。

公有制企业的增加价值满足两部分需要,一部分是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需要;另一部分是劳动者社会整体需要。企业在分配个人劳动收入之前,要扣除商品价值中用来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其余部分即增加价值,还需要做下述两项扣除:一是社会消费需要,包括社会管理、社会安全、由社会负担的教育、医疗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设施,以及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的消费需要(马克思,1965,pp. 11-12)。二是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需要。为了保障劳动者长远利益,增加价值中必须拿出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在做了上述公共扣除之后,增加价值的其余部分可用作劳动者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这部分商品价值即所谓必要价值。增加价值的两部分,分别承担着劳动者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

劳动者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相辅相成的,二者间表现的矛盾,实质是劳动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两者的对立不是绝对的。劳动者集体如果只顾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从长期看就会放慢经济增长

速度,最终损害每个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因此,二者的关系要总体权衡,以实现劳动者利益最大化。一般而言,必要价值体现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剩余价值体现劳动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两者结合就是“劳动者完全利益”。作为公有制企业生产目的的增加价值,融合了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内容,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共享发展的本质特征,在微观经济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普照之光”。

(四) 多种所有制生产目的的差异性

分开看,各种非公经济组织的生产目的,与社会生产目的都不一致。

个体经济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个体经营者个人与家庭的消费需要。市场经济体制中,个体经济的生产目的也是通过商品售卖来实现的。少数经营很好的个体经济还想着进一步发展,会把自己的“增加价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当前消费,一部分准备未来扩大生产。即使如此,大多数个体经营者的目的还是很明确的,即为了改善生活,为了个人与家庭的消费利益。

私营企业的生产目的是利润,即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相差不大。企业生产当然会生产增加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但对私人企业主而言,必要价值是用来支付工资的生产成本,与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没有根本区别。追求剩余价值是私人企业生产的全部目的,必要价值在这里表现为实现生产目的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预付资本中的可变资本部分,而不是生产目的本身。私有资本的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

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生产目的在共性前提下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公有制经济追求劳动者完全利益,其企业生产目的是全部增加价值,但不同公有制企业生产目的侧重点不同,这是问题复杂性的一面。

集体经济关注的重心在于劳动者个人收入,把必要价值放在第一位。合作社有“盈余分配”,但这不是合作社生产的首要目的。合作社为其社员服务,保障每个劳动者个人及家庭的劳动收入,这才是首要目的。一般而言,集体经济的生产目的侧重于劳动者个人利益,优先满足增加价值中的必要价值部分。

国有经济采取股份公司形式,利用公有资本管理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收入分配上侧重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就体现了这种倾向。其原因首先是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剩余价值是企业竞争中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目标与职工利益会有矛盾,但公有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也代表着劳动者长远利益。从长远看,发展生产与劳动者个人利益并不矛盾。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企业生产目的虽然有差异,但并不总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制度基础与根本保障。通过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点的多种多样的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包含了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内的生产目的。社会生产目的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形式的对立统一,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对立统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对立统一。

三、增加价值的生产

(一) 增加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

增加价值构成公有制企业生产的价值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为绝对增加价值生产,即依靠扩大活劳动投入直接提升产出总量;二为相对增加价值生产,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超额增加价值。前者作为基础性方法,彰显劳动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核心地位;后者则对增进全体劳动者的福祉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劳动生产力的持续进步构成了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根本动力。

绝对增加价值是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通过追加劳动投入以实现价值量的增长。此处,价值量的增长与使用价值的增长呈同步态势。劳动投入的增加会带动价值的相应提升,但由于劳动生产率未发生改变,价值增长幅度与产品数量增长幅度保持一致。这不会提升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效率,对改善民众消费水平的作用相对有限。然而,在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扩大就业至少能防止大众生活水平因人口稀释而下降。给定人口规模不变,提高就业率是改善人均消费水平的手段之一。

相对增加价值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实现的更多增加价值生产。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的超额增加价值,会在竞争中因其他企业的模仿行为而逐渐消解。然而,同等劳动时间内创造的社会财富(使用价值)将随着先进生产力在行业内的普及而持续增长。换言之,在相对增加价值生产中,使用价值会在企业超额增加价值的周期性产生与消解中实现持续增长;长期中,价值量波动与使用价值量增长呈现分离状态。相对增加价值生产能直接增加人均物质财富,提升劳动者的消费水平,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要实现途径。

相比而言,绝对增加价值生产对消费生活的改善作用有限,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扩大就业规模、增加家庭收入,但对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不甚显著,毕竟单个劳动者创造财富的能力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相对增加价值生产以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可以实现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从使用价值维度考量,这种增长潜力是无限的。由于劳动生产率具备持续提升的空间,相对增加价值生产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要途径。

(二) 绝对增加价值生产及其局限性

绝对增加价值生产通过扩大劳动投入实现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增长。企业扩大劳动投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挖掘现有员工潜力,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等方式;二是扩大用工规模,充实劳动队伍。个体经营者与家庭经营者的劳动投入扩大方式与此类似,既可调动家庭成员劳动潜力、延长劳动时间,也可通过生育更多子女参与劳动或雇佣学徒、伙计等途径增加劳动成员。

勤劳体现了绝对增加价值生产的基本特征。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勤劳具体体现为就业率水平以及劳动时间与强度两个维度。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包括农业在内的就业人口比例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正是勤劳特质的重要体现。中国人的勤劳还表现为较长的工作时间与较高的劳动强度。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差距,还要靠辛勤劳动参与国际竞争,这实质上是以绝对增加价值生产的方式谋求经济发展。

中国传统农业在漫长历史时期主要依赖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推动生产发展。15 世纪前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几乎同步出现农业产出的大幅增长。在欧洲,西欧地区的农业剩余逐步向工业领域转移,形成了日益延长的分工链条和日益发达的机器生产。在大陆另一端,中国的农业剩余未能实现向工业领域的大规模转移,更多滞留于农村地区,在农业家庭经济框架内,发展了一系列劳动密集型的农业技术,如一年两熟甚至三熟作物、套种或间作等耕作制度。这些技术极大提升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效率,在同等土地规模上容纳了更多劳动人口,但未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被学界定义为内卷式农业发展模式(黄宗智,1992)。

中国的工业化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打通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才真正启动。内卷式农业的历史对当代中国经济并非毫无意义,农业劳动者 X 效率(弗朗茨,[1988]1993)的培育,即“勤劳革命”,在数百年时间内塑造了东方人特有的文化传统,为现代工业化进程储备了一支吃苦耐劳、注重效率、勤于学习、严于律己、能够适应工厂纪律的庞大产业后备军(阿里吉,[2008]2009, p. 354)。一旦条件成熟,其积蓄的巨大能量必将震撼世界。

绝对增加价值生产在增加劳动投入的同时,也需要增加配套的生产资料投入。企业绝对增加价值生产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措施:一是追加投资,复制原有

生产线,同时招募更多工人;二是强化劳动管理,激发劳动者能动性,用同样的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产出。后者与劳动强度密切相关,与历史形成的 X 效率相关,能够在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产出增长。劳动投入的扩大也可以通过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来实现。例如,企业可以实行两班制或三班制,从而在不增加机器设备的情况下使用更多劳动力。

企业还可通过安排员工加班加点来延长劳动时间。绝对增加价值生产与私有企业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具有相似性。根本的区别在于,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关系是平等劳动关系,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榨取”,而是劳动者阶级为自身长远利益而付出的更多努力。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为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Nelson,1956),共和国的第一代建设者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为国家长远发展付出了更多劳动,积累了更多剩余价值(荣兆梓和李艳芬,2019a)。实践表明,绝对增加价值生产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 相对增加价值生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1. 相对增加价值的概念解析

增加价值生产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相对增加价值生产。相对增加价值是指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更多增加价值。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同等劳动投入能够比其他企业创造出更多的增加价值。例如,新技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10 倍,1 小时劳动形成的企业个别价值仍为 1 小时,但市场交换中实现的社会价值是 10 小时。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实现了 9 小时的超额增加价值。这是相对增加价值生产的一般机制——由劳动生产力提高产生超额增加价值。

超额增加价值在市场竞争中会逐渐回归原有水平。由于部门内其他企业的效仿与追赶,部门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如此部门内大多数企业采取了新技术,单位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从原来的 1 小时下降到 $1/10$ 小时。于是,大家的 1 小时劳动仍然创造 1 小时价值,超额增加价值就消失了。但该部门生产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这才是相对增加价值生产的真实后果。形式上看,相对增加价值的生产表现为价值量的增长,实质上却是使用价值量的增加。长期看,相对增加价值生产中的价值量变动与使用价值量增长是不一致的,相对增加价值生产更多地体现为使用价值生产的扩大,而非真正的价值增长。

然而,在现代信用货币条件下,二者却在货币形态上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

现代信用货币没有自己的价值,其“币值”以其对物质财富的购买力锚定,

信用货币(纸币)数量与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直接联系。相反,货币管理当局追求币值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将货币数量与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量绑定了。这就是经济学为什么说“按不变价或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反映的是使用价值量”的原因。这一点在观察相对增加价值生产时特别值得注意。随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单位商品价值量应当同步下降,但这并不一定反映在信用货币价格上。总体而言,以购买力平价核算的增加价值直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而增长。商品价值量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下降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商品市场价格稳定前提下的企业销售额提升。总体而言,按购买力平价核算的 GDP 必然随着相对增加价值生产的发展而持续增加,相对增加价值生产在体现购买力平价的货币形式上直接表现为持续增加的数量。需要明确的是,此处实质上增加的仅仅是使用价值量,而非反映商品生产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价值量。这是理解相对增加价值概念的一个难点。

2. 相对增加价值的实现路径

企业努力提高劳动生产力,获取超额增加价值。短期看,这意味着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以同等劳动时间创造更多商品实物量,并在销售环节实现更高商品价值量。在竞争中同行企业必须迅速跟进,该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逐步缩短,创新企业的产品市场价值逐步回落,其超额增加价值将逐渐消解,最终各企业回归同一起跑线。因此,企业的超额增加价值总是短期现象,同等劳动时间所创造(并实现)的价值量长期中是不变的。在相对增加价值生产中,真正持续增长的只是商品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不仅创新企业生产的使用价值增加了,而且竞争中整个行业的生产量也大幅增长。这个过程会重复出现,因此,同等劳动时间、同等商品价值所对应的使用价值量会持续增长。相对增加价值生产本质上是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

1) 超额增加价值的形成

超额增加价值源自企业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同等劳动投入量创造的价值量会超越其他企业。例如,原先企业 10 小时可生产 1 件产品,改进后 10 小时可生产 2 件产品。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创造的企业个别价值是相同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对每个劳动者、每个生产企业均构成强制性标准。个别企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无法影响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仍为 10 小时。当产品进入市场销售环节,2 件产品的企业个别价值为 10 小时,但按市场价值标准衡量则为 20 小时,从而有 10 小时的超额增加价值。

用公式表示商品社会价值,即单位商品生产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为

$$\bar{W} = \frac{\sum W_i \cdot Q_i}{\sum Q_i} \quad (1)$$

其中, W_i 表示第 i 个企业生产某种商品的单位价值, Q_i 表示其产量。那么, 第 j 个企业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为

$$Z_j = \frac{\sum W_i \cdot Q_i}{\sum Q_i} - \frac{W_j \cdot Q_j}{Q_j} = \frac{\sum W_i Q_i}{\sum Q_i} - W_j \quad (2)$$

若 $Z_j > 0$, 企业超额增加价值便形成了。

这种价值创造在竞争中会不断回归基准水平。当企业凭借劳动生产率提升获得超额增加价值后, 其他企业会研究该企业采用的具体方法, 进而模仿、追赶领先企业。当多数企业采用新技术后, 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下降, 从之前的 10 小时生产 1 件产品降至 5 小时生产 1 件产品。从使用价值生产维度观察, 现在 10 小时生产两件产品, 产量显著提升; 从价值生产维度考量, 10 小时劳动仍然创造 10 小时价值, 超额增加价值随之消失。为获取更多增加价值, 企业需要不断创新生产方式。企业生产的使用价值, 将在超额增加价值的周期性获取与回归的过程中持续增长。

2) 超额增加价值的双重来源

具体而言, 提高劳动生产率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 一是节约生产资料, 二是减少活劳动投入。例如, 企业 5 小时的超额增加价值可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 一方面, 节约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 转移生产资料价值量相应减少。假设原先 10 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中包含 3 小时的生产资料转移价值, 企业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新型管理方式减少了生产资料消耗, 将消耗量由 3 小时降低到 2 小时; 另一方面, 企业采用新工艺、新技术以及新管理方法, 减少了活劳动投入, 原先需要投入 7 小时劳动, 现在仅需 3 小时。劳动投入节约了 4 小时, 加上生产资料消耗节约 1 小时, 合计 5 小时, 这就是企业超额增加价值的来源。

因此, 企业超额增加价值由两个来源构成: 其一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与社会平均消耗量之间的差额, 其二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活劳动量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额。二者共同构成企业超额增加价值的来源。将 $W = C + L$ 代入公式(2), 得到

$$\begin{aligned} Z_j &= \frac{\sum (C_i + L_i) \cdot Q_i}{\sum Q_i} - (C_j + L_j) = \left[\frac{\sum C_i Q_i}{\sum Q_i} - C_j \right] + \left[\frac{\sum L_i Q_i}{\sum Q_i} - L_j \right] \\ &= Z_j^C + Z_j^L \end{aligned} \quad (3)$$

Z_j^C 是企业 j 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额; Z_j^L 是企业 j 消耗的活劳动量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额。只要二者的代数和 $Z_j > 0$, 企业

就能获取超额增加价值。

现实中常见的情形是：企业采用新技术时，生产资料投入反而增加。原先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为 3 小时，现在可能因使用更先进机器设备，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增至 4 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只要转移价值增加额小于节约的活劳动量，企业劳动生产率仍可实现提升。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大于所增加的去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p. 290）。例如，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机器进行生产，虽然机器折旧方面多支出 1 小时，当前商品价值中的转移价值为 4 小时，但与此同时，原先 7 小时活劳动投入现在仅需 1 小时，商品生产的个别价值下降至 5 小时。全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提高的，超额剩余价值照样被创造出来了。

3) 相对增加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本质差异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增加价值生产存在相似性：二者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力，需要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或营销手段的创新等。创新推动劳动生产力进步，在同等劳动时间内创造更多使用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获取需要首先创造出超额增加价值，超额增加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增加价值生产共同包含的必要环节。《资本论》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系列经济学范畴，如个别价值、社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在讨论相对增加价值生产时同样适用。相对增加价值的生产，必须通过超额增加价值这一环节实现，超额剩余价值同样要通过这一路径实现。企业首先在市场上实现超额增加价值，然后扣除工人工资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企业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与获取超额增加价值的路径是基本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将必要价值视为投入还是产出，视为手段还是目的。

但更重要的是，相对增加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存在根本性区别。超额剩余价值仅仅是超额增加价值的一部分。在长期发展中，经过市场竞争，同等劳动时间创造的商品价值将回归原位，单位商品价值同步下降，最终企业的超额增加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都将消失。但是，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企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长期后果是，劳动力商品价值下降。因此，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也是相对剩余价值率提升的过程，即剩余价值相对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比例提高，这是一个价值比率问题；必要价值份额缩小，而剩余价值份额增加，即剩余价值率提高，这是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过程，工人阶级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趋于下降。

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目的是增加价值，它追求必要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同步增长，而不以单纯的资本利益为唯一目的，期望劳动者个人利益都能够随劳动生

产力的提高而增长。增加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价值形式,其终极目的仍然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增加价值生产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即剩余价值率的持续提高并非必然现象。相反,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相对增加价值生产,总体上必然伴随着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生活的改善,其结果是相对增加价值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物质财富量的持续增加。可见,二者从长期后果来看存在本质差异,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长期后果是剩余价值率提高,属于价值现象,背后体现的是特定的阶级关系;相对增加价值生产的长期后果则是使用价值量的增加、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必然地导致剩余价值率提高,而是走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4) 创新驱动: 相对增加价值生产的主引擎

超额增加价值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引擎则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创新推动劳动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企业超额增加价值的生产,其具体作用机制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机制基本相同。首先,创新企业生产超额增加价值,然后激励其他企业跟进,催生大量创新跟随者,最终使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后,单位商品价值下降,同等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量回归原点,创新企业的超额增加价值也随之消失。为持续获取更多增加价值,企业只能不断创新。企业超额增加价值“形成—消失—再形成”的过程,维持了创新驱动的社会生产力进步。

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以及劳动的社会结合方式,因此,创新必然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结合。除这两个主要因素外,生产规模对效率提升也有重要影响。随着企业规模扩大,意味着生产资料更有效使用、劳动过程更集约管理,这些都能够提升劳动生产力。国家的创新能力、国家创新体系,以及国家基础研究的发展,对企业创新构成重要的外部环境支撑。

此外,还需关注自然环境因素。随着现代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与人类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日益凸显。人类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大规模生产过程在短期内就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如果在产出增加的同时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例如破坏生态系统,或耗尽不可再生资源,那么当前的生产力增长就是对未来生产力的破坏,这是现代生产对未来生产的负外部性。若忽视这一外部性,仅满足于当前生产力的增长,从劳动者整体与长期利益的角度考量显然是不明智的。社会主义的相对增加价值生产必须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四、创新红利与经济增长

(一) 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

社会生产是连续不断的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资本价值的再生产,而且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同样是连续不断的再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劳动二重性前提下,社会再生产总是包含了资本价值再生产和物质财富再生产,资本积累是价值的扩大再生产,经济增长是财富(即使用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二者是再生产过程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没有资本积累就不会有经济增长,增长与积累始终相伴而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独立于资本积累,其增长速度并不仅仅取决于资本积累率,而且还取决于包括资本与劳动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生产目的会有所不同,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何者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会有所变化。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资本价值再生产,资本积累适用于考察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使用价值,即财富的再生产,经济增长适用于考察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经济增长是达成生产目的的基本前提。

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不仅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而且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再生产,它具有比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更重要的意义。外延扩大再生产以投入增加为前提,是财富物质量与价值量的同步增长,却较少提高劳动群众的人均消费量;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是在不增加或较少增加劳动投入的前提下使用价值的扩大再生产,这里的“扩大再生产”不仅指增加产出的数量,而且包含提高产出的质量。内涵扩大再生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使产出量增加,从而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开拓了空间,为提高劳动群众的全面能力,即实现劳动力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 生产过程的终点和起点

生产条件分配是生产过程的起点,决定生产过程的性质,也决定产品分配。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分配以生产的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相分离为特点,生产资料由资本家阶级占有,劳动者除了自己的人身条件——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因此,两种生产条件的结合只能采取资本家阶级购买劳动力商品的形式,

生产过程由资本家控制,劳动大军由资本家指挥,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条件分配发生了根本变化,全部生产条件归劳动者阶级占有,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不再存在,虽然公有产权仍然具有内排他性,公有资本与劳动者个人之间仍然存在劳动力买卖,但这种关系是劳动者阶级内部的关系,是公有资本与劳动者的共享合约,平等劳动体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性质,劳动者共同劳动的产品归劳动者所有,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在劳动者个人间平等分配。

如果说在单个生产过程中,产品分配是生产过程的终点,那么在再生产过程中,这个终点同时又是下一个过程的起点。产品分配同时也是生产条件的再分配,它在再生产的起点上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再生产过程揭示生产关系中某些从单个生产过程难以看清的问题,如资本主义生产在起点上看似由资本家垫付了工人工资,但在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对象化劳动预付给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b,p. 655)的事实再也无法掩盖;“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pp. 657-658)。

社会主义的再生产也有这样的特征,看似是产品分配的结果,却能在再生产过程中影响下一轮生产的起始状态,在连续不断的再生产中,产品分配的规律对理解再生产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在单一生产过程中难以看清楚的问题,在再生产过程中得以展现。社会主义的简单再生产,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也没有劳动者消费生活的变化,所有的矛盾与关系在静止状态中似乎是清晰的。然而,社会主义再生产本质上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旧的平衡被打破和新的平衡再建立,给我们打开了考察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的窗口。

从单一生产过程看,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中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化,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量不变,因此劳动者的消费生活水平也不会变。变化似乎是由外生变量引致的,一个是人口增加,一个是资本投入增加。但从再生产过程看,这些外生变量马上就内生化了。首先,追加资本从哪里来?如果没有外部来源,它就必须从劳动者消费基金中“节省”出来,于是,不变的消费生活会有明显的改变;其次,如果没有大规模外来移民,人口增加就必须由当前的劳动者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负担,这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消费生活同样有深刻影响。

从单一生产过程看,即使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似乎也只是影响本轮产出的数量,改善劳动者当前生活水平。但从再生产过程看,这一产出水平的提高就不仅决定当前消费,而且因为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对此后的生产和消费有长远影响。弄清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这方面的问题,是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

的关键一环。

社会主义的再生产与资本主义不同,它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并不是由市场逻辑——劳动力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的,不是像私人资本那样,事先确定工人工资(劳动力商品价值),事后再从企业增加价值中扣除工资获取剩余价值,而是能够在已实现的全部增长价值中统筹考虑劳动者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对灵活地在两个利益之间作出权衡。公有制企业必要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不是两个阶级的权利分割,而是同一阶级内部平等劳动的利益协调,其分配的灵活性是由公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这一点在社会范围的考察中会更加明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根据形势变化自觉调控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并在长期实践中把握规律,实现劳动者完全利益的最大化。

(三) 基于创新红利的分析框架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不断提高。生产力提高当然需要创新,有创新就会有创新红利,这是从物质资料增加意义上理解的“红利”,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它完全归劳动者所有。因此,创新红利的分割不涉及阶级关系,而是劳动者阶级本身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它深刻影响社会主义的再生产过程。

为方便讨论,可构建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给定社会劳动(也适用于企业,但这个实物量模型在社会生产层面更容易理解)总量不变(同等长度的线段表示相同时间的劳动),以不变价为标尺衡量社会(或企业)净产出实物量,考察劳动生产率变动前后两个时期(T_0 与 T_1)的净产出分配。从社会范围看,这个净产出不过是相对增加价值的社会总量,它会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当然也要在社会范围内不断地分割为个人所得(必要价值)与社会所得(剩余价值)两个部分。

图 1 中 T_0 期净产出实物量为 12 个单位,社会产品中有一半用于个人及其家庭消费,另一半由社会统一支配,劳动者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分割点在线段中间圆点处;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为 1:1,从价值形态看,剩余价值率为 100%。由于劳动生产率较低,这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剩余价值占净产值的比重为 50%,大部分被用于公共消费,假定非生产劳动部门从公共消费中消耗的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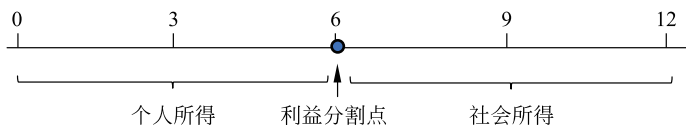


图 1 T_0 期的净产出(实物量)与利益分割点

物量,占净产品的 33.3%,资本积累率(新增投入占净产值的比重)只能达到 16.7%。如果资本产出比为 5:1,则经济年增长率为 3.3%。

假设 T_1 期比 T_0 期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单位劳动的净产出实物量也增加一倍,同样的劳动总量能够生产出 24 单位物质产品,社会总产出实物量增加了 12 个单位,在劳动者个人所得与社会所得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这增加的 12 个单位就是创新红利。直观地看,图 2 中间从 6 到 18 的区间便构成这个劳动者社会的待分配创新红利区间。如果利益分割点落到点 6 处,即个人及家庭消费水平不变,全部创新红利由社会占有,在公共消费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可以极大提高;如果利益分割点落到点 18,则社会占有的物质财富不变,劳动者个人及家庭享有全部创新红利,消费水平可以提高到之前的三倍,但经济增长率只能维持在低水平。两种情况对劳动者社会而言各有利弊。劳动者社会会选择当前条件下最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点,因为有质量的长期经济增长一定是最有利于劳动者完全利益的,这个点应当位于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既不必然在原利益分配点的左侧(偏向资本积累),也不必然在其右侧(偏向劳动者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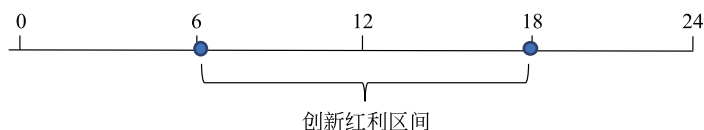


图 2 T_1 的净产出(实物量)增加和创新红利区间

由此,我们立即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在两大阶级的对立中进行,如果说其间也有创新红利分配问题,那么它的红利区间却比社会主义要小许多。关键是资本家阶级以剩余价值率不降为“底线”,或者叫“剩余价值率刚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资本家阶级不可能接受,在生产力提高前提下,资本所得的剩余价值反而下降。所以,如果没有战争或者危机等灾难性事件,资本主义的创新红利区间只能在 T_1 线段的 6 到 12 之间。这一红利区间意味着,在生产力提高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红利分配点总是从原点向左移动,每一次的移动幅度可大可小,但其移动的方向不变。因此长期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或者说工人阶级不可逆转的相对贫困化。

社会主义的创新红利分配明显突破了这一局限。我国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净产品利益分割点的移动方向曾出现过多次反转。上世纪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社会总剩余价值率的变动方向总体而言是上升的,这意味着利益分割点的左移,它造成积累率的持续提高,为工业化的启动和独立完整

工业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最初 20 年,社会总剩余价值率趋于下降,即利益分割点右移,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快提高,为改革提供了激励,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市场。90 年代中期以后,企业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到位,竞争导致剩余价值率快速上升,利益分割点再次左移,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加快融入世界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环境污染、收入差距拉开等负面问题(荣兆梓和李艳芬,2019b)。近 10 年来,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势头有所遏制,情况正向相反方向转变。实践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有着与资本主义积累不同的一般规律,其利益分割点的左移或者右移都向着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劳动者阶级的完全利益。主导这一增长进程的,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和一个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这一制度下公有制企业对增加价值,特别是相对增加价值的不懈追求。

五、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财富和贫困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是:劳动者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积累需要和消费需要一起增长。无论创新红利如何分割,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将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会逐步提高,进而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也会逐步提高,这反过来又会推动创新加速,形成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规律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规律的根本区别。

(一) 经济增长中的消费增长

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劳动者消费增长。如果消费在净产出中的占比不变,则消费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一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消费的高速增长;经济低速增长,消费也就低速增长;假如经济增长停滞,消费最多也就只能处于停滞状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经济持续增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当然,如果社会净产出总量不变,提高消费比例也可以提高当年社会消费总量。但问题是,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不断增长的,所以,社会生产目的的实现也需要从长计议。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必须是可持续的,只有这样,消费才能持续不断地增长,人民群众的长期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保障。进一步说,社会发展中人口数量也在变动,经济增长幅度必须超过人口增长幅度,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必须是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假定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不变,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才能保

证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就业人口)增长速度,进而带动全社会人均消费量的增长,保障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需要。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中形成的创新红利,必然是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结果。创新红利分割点的移动会影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进而影响消费增长与积累增长的先后顺序。长期看,更高的积累率是维持更高经济增长率的必要前提,一个社会经济体要保持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保持高的资本积累率(罗思义等,2024)。积累是增长的前提,因而积累提高与消费增长具有一致性。从长期看,保持给定约束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积累率,才是实现经济增长、进而带动消费增长的最优路径。实现这一理想状态的前提条件是,剩余价值的形成和分配不再受资本家阶级的主导和盘剥,阶级对立不再干扰经济社会的重大决策。

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发展中形成并且保持了社会经济的高积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实现了人民群众消费的高增长。在此过程中,创新红利分割点时而左移,时而右移,努力争取经济的较快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始终是国家经济治理的中心议题。实践证明,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与人民群众消费生活的提升从长期看显著正相关。经济增长了,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更多了,人民群众可用于消费的物质产品就更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终必然会落脚到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提高。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资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市场经济下,始终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迫使劳动超出必要时间之外提供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便是资本积累,它是经济增长进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积累要经过资本家阶级的“中转”,这个阶级作为资本积累功能的人格化代表,不仅控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而且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资本家阶级之手转化为资本,实现资本积累。作为实现这一社会功能的“奖励”,这个阶级优先用剩余价值满足自身和家庭消费所需,成为这一制度下资本积累的一个固定的扣除。

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这部分“社会成本”并不是必要的。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私有制经济的比例减少,公有资本在全部社会资本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因而社会剩余价值总量也占有很大份额,不再需要经过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性提取,再进入积累过程。这从两方面影响社会经济的总体格局。一方面,由于减少了对剩余价值的这部分额外消耗,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社会总消费中资本所有者的消费份额相应下降,工薪阶层的消费比例有所提高,这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正因为

资本积累的这一制度性差异,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中的消费增长,能够更多地表现出劳动者消费增长的特点,表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点。

(二) 消费增长促进劳动者能力提升

1. 消费规模与消费结构

经济增长和消费生活增长是全面提升社会劳动大军总体素质的必要条件,同时,消费高质量发展也是劳动者劳动能力全面提升的必要条件。消费高质量发展就是劳动者在社会主义消费文化的引导下释放消费潜力和加快消费升级。消费升级表现为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优化,而消费结构优化表现在人们对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这类低收入弹性商品的需求会降低,而相应地增加满足自身发展型、享受型需求的高收入弹性的商品,如娱乐型、教育型的产品和服务。这些高收入弹性商品在劳动者消费中的比重提高,能够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消费文化存在国别差异。中华文明的消费文化中有一些好的传统,如反对奢靡消费、倡导道德修养,注重子女教育等。即使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老百姓也愿意把大量的消费收入用于子女的教育。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消费发展中,我们可以充分发扬这种优秀文化传统,将之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消费文化相结合,通过政府倡导和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等,培育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形成增长、消费和人的能力相互促进的发展机制。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一开始是个自然过程,它首先解决的是温饱问题,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真实反映了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随着温饱需要逐步得到满足,衣食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消费结构开始演化,由更多的物质消费转向更多的精神消费和文化消费。消费结构演化伴随消费规模扩大,是消费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消费文化倡导健康积极的消费观,反对奢侈性、炫耀性消费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社会主义消费文化的核心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与劳动者全面能力提升的统一。没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消费文化与相应的消费结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提高劳动者消费能力。

政治经济学如何定义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归根结底,美好生活要促进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使所有人的潜在能力能够得到越来越充分发展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我们不仅能感觉到幸福、感觉到满意、体验到获得感,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在不断地提升,我们自身的潜能和价值,都在这种美好生活中体现和实现。所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和美好生活,和劳动者劳动能力的提升是高度统一的。

2. 公共消费提升劳动者消费质量

高质量公共消费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公共消费作为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直接推动劳动者消费水平增长,而且是拉动消费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可靠保障。较高的公共消费水平能够发挥“挤出效应”,减轻消费者负担,提升劳动者个人消费能力。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可以充分释放社会消费活力,有助于增强劳动者购买力和提升消费质量。

从构成来看,公共消费不仅包括社会管理费用、社会安全费用等最终服务于劳动者利益的内容,还包括大量直接涉及劳动者消费生活的公共支出,如社会文化、科学研究、教育和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提升劳动者能力的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公共支出在这些方面的规模不断扩大,比重也在不断提高。公共消费支出规模的扩大最终提升劳动者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

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比例偏低,我国情况也不例外。但是,考虑到我国政府在上述公共消费领域的大规模支出,对劳动者消费生活的总体情况应当有更全面观察。譬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20世纪70年代末,人均GDP还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是,政府在50年代开展的群众性扫盲运动、符合农村实际的赤脚医生等举措,对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那一发展阶段,我国人口预期寿命比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如印度)高出许多,这应该是公共消费提升劳动者生活消费水平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从结构来看,公共消费对劳动者消费质量提升影响更加显著。我国公共消费的主要部分都与劳动者能力提升直接相关,特别是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的支出,是促进劳动者能力和发展机会平等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劳动者收入会有一定差距,加上家庭人口和健康水平的差异,消费支出也会有很大差距,这不仅影响家庭消费水平,而且会影响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劳动能力的差异有很大部分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劳动者及其子女成长条件和受教育机会出现较大差异,这不符合劳动能力发展机会平等的原则。国家与社会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那就是提供基础性的教育平等和医疗平等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教育公平是劳动者能力发展机会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应当在这个方面承担更重要的责任,通过扩大社会公共消费支出的方式来实现。此外,医疗方面也更多需要社会来承担,社会应该尽可能地为民众提供覆盖全社会的较高水平的基础性医疗保障,实现全民共享的城乡平等的公费医疗制度,确保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基础性医疗保障。

公共消费还包括城乡基础设施投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三方面内容:生产性的基础设施、生活性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性的基础设施。生产性基础设施

是为生产服务的基础设施,包括通信,运输等,它们越完善越能提高生产的效率。生活性基础设施主要是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提高人民幸福感的一些设施,如水电铺设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与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不能完全割裂开的,如很多通信类、运输类基础设施不仅仅是为生产服务的,它们同时也是为生活服务的,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第三类基础设施往往容易被忽视,它们就是社会性基础设施,包括整个科教文卫,它们是关系到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社会性基础设施与生活性基础设施有一定关系,但两者的侧重点又是不同的。生活性基础设施是与人民生活的改善直接相关的,包括客运交通设施、互联网及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平台。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更多的是用于提升劳动者能力。

总之,劳动者个人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不是对立的关系,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界线。那种认为满足劳动者美好生活需要只能靠给劳动者多发工资奖金的观点是片面的。社会集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特别是公有制经济集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最终还是会落实到满足劳动者美好生活需要上。社会公共消费的增长最终会转化为个人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提高,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关系。

3. 经济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投资于人”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把“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列为我国“四大优势”之一。加快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重要基石和基本支撑,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人口质量包括人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养以及思想道德素养。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基础以及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客观前提;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为提高人口质量提供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引领。

随着消费水平提高,特别是消费质量提升,劳动者个人选择已经从劳动力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内涵扩大再生产,从追求人口数量转向追求人口质量。一是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消费增长,身体素质提高,更加健康长寿。二是

^① 新华网:《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5月5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3-05/05/c_1129592754.htm。

劳动者生产技能和科学文化水平提高,需要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教育在整个人口质量提升中属于最具渗透性的因素,通过不断提高文化素养,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提高社会生产力。三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使得个人偏好与社会利益相统一,将人的外在行为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修养。

随着经济增长,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日臻完善,中国提前进入与高收入国家人口发展相似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状态。劳动者社会的选择是在尽可能保持总量和结构均衡发展的前提下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一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政策导向下,教育普及率更高,基础教育水平也得到较大提升,劳动者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增长,人口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二是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的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向广泛化和深入化发展,提高了劳动力供需匹配质量。三是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学科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家支持鼓励普通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更高质量的科研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

社会主义的人口质量提升规律,是劳动者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不断加大对科教文卫事业的投资,不断提升科教文卫水平,从而促进了人口素质整体提升,进而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还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劳动者希望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劳动者既要有健康的体魄,也要注重自我提升,提高劳动能力。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以自身发展为取向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保持总体一致。

(三) 劳动者能力提升是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劳动能力全面提升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劳动者创新潜能的不断开拓,它必将促进创新发展,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d, p. 225)。社会主义的创新激励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超额剩余价值对企业家的创新激励,一个是劳动致富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创新激励。尤其是后一种创新激励对劳动者创新潜能的发掘具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创新能力的不断拓展一定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生产关系,要求生产的物质条件与人身条件平衡发展的技术进步路径,随着我国科技与产业发展在全球范围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社会主义的技术

进步路径将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养和创造力持续提高,其推进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首要作用还会进一步凸显。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更加协调,二者共同指向劳动者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环节。劳动者能力提升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辩证过程。首先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生活改善,进而劳动能力得到发展,最终带来更多的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种社会生产力与劳动者能力发展的辩证统一、良性循环,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如图 3 所示,这里有四个逻辑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经济增长必然地带动劳动者消费增长,第二个环节是消费增长促进劳动者能力提升,第三个环节是劳动者能力提升推动创新加速,第四个环节是创新加速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不竭的源泉。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上述诸环节之间不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对抗和冲突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基本矛盾不再是阶级对立关系,平等劳动成为基本关系,因此有一个良性循环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再需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再需要暴力破坏的形式来恢复宏观经济的平衡。劳动者个人与社会利益的协调,确保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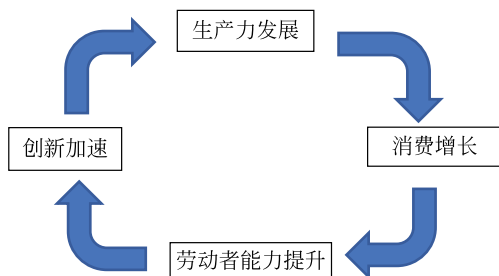


图 3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四) 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发挥作用的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一些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

其一,在经济赶超阶段,由于系统性地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引进技术,这些以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去技能化”为特点的先进技术,适应资本主义下劳动对资本实质从属的制度环境,总体上不支持资本对劳动的实质从属。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企业劳动关系的完善还缺乏必要的技术基础,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控制力更强,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较弱。这一状况在一段时间内

会妨碍劳动者收入随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甚至导致相反结果。

其二,中国工业化起步时人口快速增长和农业劳动人口大规模溢出,导致劳动力市场长期供过于求,不仅造成了持续的就业压力,而且抑制了工薪劳动者,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工薪劳动者的市场议价能力。这些因素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的顺利实现也起到了阻碍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经济增长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一现象正在发生转变。

其三,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发育不完备,市场秩序不规范,以及各级政府经济治理能力不适应和反腐倡廉不到位,导致了资本盲目扩张,竞争秩序紊乱等,也都对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而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产生了不良影响。

最后,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特别是农业、农村经济的现代化还没有一定程度发展时,国家在劳动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推进步伐还不能太快。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职责,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得以实现的必要环节,但国家必须量力而行,否则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克服所有这些因素的阻碍,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的实现,除了党和国家的明确制度导向之外,最终还需要有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两个本质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改善民生和实现共同富裕——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形成良性循环。

六、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历史趋势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以社会生产力与平等劳动的动态耦合为阶段性标志,表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科层的平等劳动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动态耦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竞争的平等劳动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动态耦合,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系统协调的平等劳动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耦合。它的分阶段发展将越来越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在优势。经过长时间持续的增长与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将把我们导向平等劳动的终极目标,在生产力极大提高的前提下经由系统、协调、共享的平等劳动,通往自由的平等劳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中国经济将进入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享的平等劳动共生演进的新时代。随着创新动力源的转换,再往后的30年或者一个更长一点的时间里,中国将与世界一起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

业革命推进的社会生产力的质的跃升。这场变革由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学与绿色技术的突破性创新推动,以生产的智能化和绿色化加速为显著特征。科学技术的突破特别是智能化技术的突破反过来又提高科学研究本身的手段和能力,进一步加速科技与产业相互促进的进程。未来几十年,新一代基础性通用技术的推广必然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的系统性、颠覆性突破。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为载体、由强大算力加持的“智能体”,将嵌入越来越高效的机器系统,成为人类劳动手段的新形态;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交叉融合将使得机器系统和生物系统的界限模糊,一个兼具智能体与生物体双重特征的自动化体系将呈现出更多自组织、自学习功能,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力新质态。

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多数科技界的代表人物都表示乐观。近期,创新型企业家、硅谷著名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专门撰写长文,称 80% 的行业将被 AI 取代,人类将迎来三天工作制,甚至每周工作一天也不是不可能。为了应对失业危机,他主张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①。这种乐观的预期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即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社会形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就业或者收入分配,而在于财产权利的占有,或曰生产条件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权归谁所有,谁就有支配他人劳动,进而决定财富分配的权力。资本家阶级可以为稳固自己的统治而给全民发放“基本收入”,但财富增加的更大且越来越大的部分将集中到财富精英手上。普通人的“基本收入”不过是维持吃饱肚子的“体面生活”而已。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路径永远是以对劳动的控制为底线的,因此其技术进步路径,总是选择最大限度偏向机器、偏向网络空间的“智能体”和高度自动化的机器系统的演进路径,劳动者的技能发展则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技术精英以及财富精英与广大劳动者之间的鸿沟只会越挖越深,这种社会的撕裂不是单纯的技术进步所能弥合的。

新科技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巨大收益和福祉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性。科技进步如果利用不好,可能反过来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风险。古往今来,这种事例比比皆是。科学技术运用不好都会反过来伤害人类自身,可能会变成杀人的武器,变成破坏力量;生物技术的发展现在也很快,为了防止它的负面影响,要制定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总之,生产力的发展将超乎我们的想象,而其将在怎样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带来人类社会的变革,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① 新智元微信公众号:《硅谷风投大佬 Khosla 正经预言:80% 行业被 AI 取代,人类终将进入“闲暇时代”》,2024 年 10 月 6 日,<https://mp.weixin.qq.com/s/0pG9PVR2YxsK1EeTFbr6Bw>。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阶段将通往真正意义的共享发展。如果社会主义中国在新一轮生产力质态跃升中走到世界前列,自主创新,而不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形式,社会主义技术进步路径将以压倒的方式替代资本主义技术进步路径,以劳动者科学素养与生产技能的全面进步,协同智能体加持的自动化机器系统更快发展。劳动者将逐步提高在生产过程中的控制力和主导性,进而在生产与研发的过程中与“科技精英”相互协调、逐步融合。资本与劳动的共享,不同分工岗位从业者的共享,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有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劳资共享的、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形成。

平等劳动发展的最高境界是自由的平等劳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持续发展必然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导向共产主义的前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下,作为“必然王国”的物质生产劳动时间越来越短;旧式的把人固定在职业岗位上的分工,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再是必要条件;直接生产成为一个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过程,全面发展的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附属物,而成为站在这个过程旁边控制、监督和调节机器系统的主人;所有能够让机器去替代的劳动都让机器去做。平等劳动终将转化为自由劳动。

人们会把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时间当作可供自由选择的“工作时间”,即自由发展时间,去探索世界,去从事各种各样的科学与艺术的创新劳动。劳动与人的本性回归统一,与人的好奇心和人类由生物基因所构造的具有巨大发展潜能的根本特征相适应。人类本来就有这样的基因构造,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它不仅隐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而且沉淀在长期交往形成的人类社会中。自由的创造性劳动正是这一社会系统无尽潜能的终极来源。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终将被淘汰,代之以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以智能化网络为中介的、有计划并按比例发展生产的自由人联合体,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将让位于以需要为尺度的平等。商品、货币与资本将走向消亡,劳动将真正成为人的个性、本质发展的需要,成为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前提。平等劳动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终通往无须以劳动为财富尺度,无须以资本为组织力量的自由劳动,指向共产主义的未来。

参考文献

- 凤翔. 2019.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对比研究[J]. 北方经贸, (1): 47-48, 66.

- Feng X. 2019. Comparative study on socialist basic economic law and value law Fengxiang[J]. Northern Economy and Trade, (1): 47-48, 66. (in Chinese)
- 黄宗智. 1992.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 中华书局.
- Huang Z Z. 1992.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Delta[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罗杰·弗朗茨. 1993. X效率: 理论、论据和应用[M]. 费方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Frantz R S. 1988. X-efficiency: theory, evidence, and applications[M].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Group.
- 罗思义, 罗一, 吉塞拉·塞尔纳达斯. (2024-10-05)[2025-01-12]. 罗思义、罗一、吉塞拉·塞尔纳达斯: 从 210 个经济体大数据中, 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EB/OL]. https://www.guancha.cn/LuoSiYi/2024_10_05_750743.shtml.
- Ross J, Singham R, Cernada G. (2024-10-05)[2025-01-12]. By analyzing data from 210 economies, we have uncovered the secrets of China's and the world's economic growth[EB/OL]. https://www.guancha.cn/LuoSiYi/2024_10_05_750743.shtml. (in Chinese)
- 马克思. 1965. 哥达纲领批判[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6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孟捷. 202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规律新论[J]. 学术月刊, 54(12): 34-45, 58.
- Meng J. 2022.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laws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socialism[J]. Academic Monthly, 54(12): 34-45, 58. (in Chinese)
- 乔万尼·阿里吉. 2009. 亚当·斯密在北京[M]. 路爱国, 黄平, 许安结,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Arighi G. 2008.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M]. New York: Verso Books.

- 荣兆梓. 1996. 论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J]. 经济研究, (9): 16-23.
- Rong Z Z. 1996. On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public property right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9): 16-23. (in Chinese)
- 荣兆梓. 2023. 论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的资本形态: 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J]. 人文杂志, (6): 10-20.
- Rong Z Z. 2023. On the capital forms of socialist public capital: state-owned capital and collective capital[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6): 10-20. (in Chinese)
- 荣兆梓, 李艳芬. 2019a. 积累率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故事[J]. 政治经济学报, 15(2): 3-21.
- Rong Z Z, Li Y F. 2019a. Accumulation rate political economy: the story of China in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5(2): 3-21. (in Chinese)
- 荣兆梓, 李艳芬. 2019b. 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研究: 基于中国经济增长 70 年[J]. 教学与研究, (9): 42-57.
- Rong Z Z, Li Y F. 2019b. Research on the law of socialist accumulation—based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or 70 years[J]. Teaching and Research, (9): 42-57. (in Chinese)
- 荣兆梓, 王亚玄. 2021. 增加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与社会主义创新激励的两重来源[J]. 当代经济研究, (8): 5-16.
- Rong Z Z, Wang Y X. 2021. Two approaches to increasing value production and the dual sources of innovation incentives under socialism[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8): 5-16. (in Chinese)
-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9.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Institute of Economics,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1959. Text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I)[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Nelson R R. 1956. A theory of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6(5): 894-908.

An Outline of the Basic Economic Law of Socialism

RONG Zhaozi¹ LI Yaping²

(1.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ree major tenets of the basic economic law of socialism in accordance with a three-tiered logical framework: the purpose of production,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production. Firstly, the labor-capital sharing contract dictates that the production purpos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ust balance the individual interests of worker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s. This enterprise production purpose, which encompasses the “complete interests of workers”, is added value. It is merely the manifestation in the form of value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of the social production purpose of “meeting the people’s growing expectation for a better life”. Secondly, there are two production methods for added value: absolute added value production and relative added value production. Among them, relative added value produ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the socialist production purpose. Relative added value production is driven by innovation, enabl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Finally, the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dividends in socialism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the overall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of workers, and maximizes the interests of all the people through a balance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accumulation. This determines that the law of economic growth in socialism can only be as follows: economic growth drives up the consumption of workers; consumption growth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workers’ capabilities; the improvement of workers’ capabilities drives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which in turn drives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he social economy. This is a process of virtuous cycle and spiral ascen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law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at the polarization of capitalism inevitably leads to economic crises.

Keywords: labor-capital sharing contract; absolute added value; relative added value; innovation dividends; the general law of socialist economic growth